

□ 访古探幽 ■ 林小龙/文 林小龙 高展澍/图

陈谨墓碑铭新考

陈谨,字德言,号环江,明嘉靖三十二年(1553年)状元。迁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而终,葬于闽县至德里洞山(今洞头山,属长乐区营前街道洞头村),此地也因此而闻名,俗呼状元岭。

陈谨墓现为长乐区级文物保护单位,墓亭等构件保存完好,墓亭后镶嵌着一块上圆下方的黑色石碑,尤为珍贵。《长乐六里志》载:“殿撰陈谨墓表□文阙。在至德里洞头山。明徐阶撰文,碑箝于墓,以年久剥落不可辨。”若依此说法,墓碑(表)铭应是徐阶所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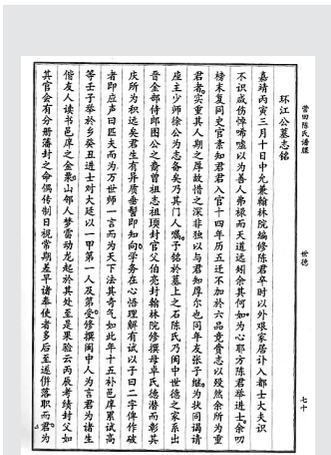
徐阶,字子升,松江华亭(今上海市松江区)人,嘉靖二年(1523年)进士,探花,历礼部尚书、建极殿大学士、内阁首辅,是陈谨赴春闱时的主考官,赏识他的才华与言行,亦师亦友。

陈谨墓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,墓碑长期裸露,多数碑文在民国后期李永选编纂《长乐六里志》时就已辨识不清。长乐文史专家张善贵所撰的《长乐金石志》按语曰:“墓碑已剥落,上首篆文‘陈编修环江陈公墓碑铭’十字,犹完好。未署大明嘉靖四十五年,其余模糊不可识。”他也赞同李永选先生的观点,认为“墓碑铭为徐阶撰文”。

那么,问题来了。一个公认的史实是,陈谨墓志(铭)是徐阶所撰,有《福州府志》等众多史志(含《长乐六里志·陈谨传》)可佐证,徐阶的著作《世经堂集·卷十八》中也存有篇目《明故右春坊



陈谨墓在长乐营前洞头,毗邻沈海高速公路。



新修《营田陈氏谱牒》所载陈谨“墓志铭”,实为“墓表(碑)铭”。

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陈君墓志铭》(亦收录于《国朝献征录》),可证实就是陈谨墓志(铭)。莫非徐阶既撰墓表又撰墓志?

“墓表”即墓碑,因其立于墓前或墓道,以表彰死者,故名,一般在墓外。“墓志”,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古代汉语词典》(第2版)作如此解释:“墓志铭,刻在石碑上埋在墓中的铭文。”一般在墓内。

蹊跷的是,《长乐金石志》记录了残缺的“徐阶撰文”的“陈谨墓碑铭”,也记录了完整的“孙铤撰文”的“陈谨墓表铭”,后者出处为《石门营田陈氏族谱》。黄宗羲《金石要例》曰:“碑、表施于墓上,以之示人,虽碑、表之名不同,其实一也。”也就是说,“墓碑铭”就是“墓表铭”,何以别述?而依明朝丧制,也不可能由二人各写一篇“墓表(碑)铭”。唯一的可能是,《长乐六里志》及《长乐金石志》皆混淆了“墓表(碑)铭”与“墓志铭”,以致2009年版《长乐乡土文化丛书·营前》及2021年版《长乐海丝拾古·营前

篇》对陈谨墓的表述也相沿其误。另外,《长乐市志(1995-2005)》第二十九篇载“徐阶为他(陈谨)撰墓志铭,称其‘为闽士之光’”,而墓志中并无此句(“陈谨墓表铭”中亦无),出处成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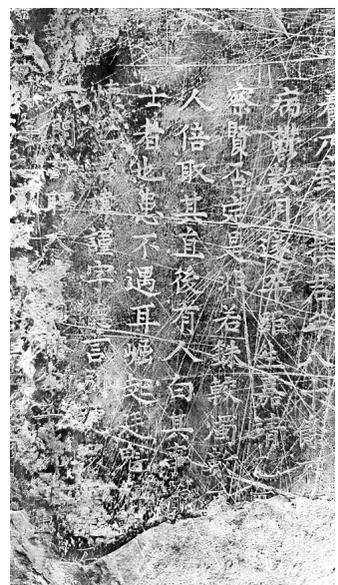
最有效的考证自然是对照文献、实地探碑。此碑高约99厘米,宽约55厘米,实际上部分字迹仍清晰可辨,其中“少师徐公为志,备矣”一句基本可否定墓碑铭作者是徐阶的说法。另外,2008年重修的长乐江田石门《营田陈氏谱牒》所载《环江公墓志铭》(实为墓表铭)及《长乐金石志·陈谨墓表铭》,与实地碑文基本相符。碑额存篆刻大字“院编修环江陈君墓碑铭”,余已漫漶,由马自强篆额。碑正文为楷书,字径约1.2厘米,实由孙铤撰文、陈联芳书丹,可辨识的共约367个字。马自强(陕西渭南人,官至礼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,尝修《大明会典》)、孙铤(浙江余姚人,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,尝校《永乐大典》),为陈谨同年进士,曾共事于翰林院;陈联芳(长乐江田人,历南京太常寺卿致仕)为嘉靖三十五年(1556年)进士,是陈谨门生及同乡(陈谨祖上由长乐江田石门迁闽县光俗里营前)。

墓碑铭中有“同年友张子维为状”一句,按图索骥,笔者在张四维《条麓堂集》中寻得《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环江陈公行状》一篇。张四维,字子维,山西芮城人,历史部尚书、中极殿

大学士、内阁首辅,亦是陈谨同年进士。

至此,墓表(孙铤撰)、墓志(徐阶撰)、行状(张四维撰)得其全貌,足以勾勒出一个谨言笃行却又“性度汪洋”、“见者莫不敬爱之”(王应山《闽大记》)的真实的陈谨。

陈谨贵为状元,因持正不阿,为官十四载仅至六品,虽怀才抱器,却赍志以歿。他的意外离世让恩师徐阶痛彻心扉,感嗟“朝廷失一士矣……望之素深,每忘其死”。这些文字铭于“墓中之石”,与“墓上之石”共同诉说着陈谨的嘉言懿行。



陈谨墓碑,不少碑文仍清晰可辨,与族谱及《长乐金石志》所载有少许差异。

□ 闽籍人物述林 ■ 江榕

闽派中医郑孝铭

一代名医郑孝铭为人被世人所称道。海军将领萨镇冰为其书“寿世寿人”,北洋海军总长刘冠雄赠其“造福梓乡”匾,林森赠其“功同良相”匾额。

郑孝铭(1882-1935),字惟正,出生于中医药世家。

自古就有“医儒不分家”之说,宋代范仲淹“不为良相,当为良医”理念对古代读书人有所影响。那时很多读书人都精通医理,郑氏中医一代祖郑存空也是一位名中医,平素精研“岐黄之术”。他世居福州南门兜教场坂,是清道光年间武秀才,后弃武从文,并得中举人。1872年,郑存空在南门兜圣庙路口创办“瑞来春参行”。1914年,郑孝铭、郑孝建接管“瑞来春参行”,店招牌仍旧,但在此后的业务往来和账目记录的单据上均加盖“正记”两个字。

郑孝铭从小耳濡目染,自然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。他随母亲杨氏学习针灸,还向叔祖郑祖周

学习《伤寒五法》《瘧症指南》及各家歌诀,谙熟中医经典。后来他买下南门兜来魁里谢道承旧宅及陈懋侯、陈建侯兄弟别业。该建筑共有五落大宅院,大院东边前、后花厅作为坐诊施药之所。

郑孝铭擅治温病、瘧症、黄疸、中风、消渴等症状,著有《温病治法》《瘧症治疗》《小儿针灸》《药材真贋辨》等。他还常与当地名医会诊拟方,诊症准确,用药精当,著有《孝铭医案》。他将医术传子郑心慈、郑心辉、郑亦资、郑亦康、郑元昌及侄、甥、孙子等。这些后辈中不乏名医,不仅能行医造福百姓,且能著书立说为中医发展作贡献。

其中,郑亦资曾任福州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,编写了《农村常用药物手册》等;郑亦康曾任福州中医学会理事,著有《概述脾胃的重要性》等;郑元昌著有《医林随笔》《医门十劝》《郑元昌医案》等。为了能让中医发扬光大,郑孝铭还将家学无私地传授给虔心

学医之人,如长乐李跛仙(松藩)、台湾高雄杨运铨等。

在三坊七巷中有郑孝铭的故居,位于文儒坊大光里18号(郑元昌宅),门口曾贴着一副陈宝琛所赠的对联,上联是“金匱玉函藏济世”,下联是“南山北海祝长生”。上联中的“金匱”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,此书被后世分为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匱要略》两部,是中医经典著作,郑孝铭饱读中医典籍,是为了济助世人;下联则表达了这位名医希望天下人都得长寿的美好祝愿。回溯时光旧影,他曾在此为中医学的传承播撒希望的种子。那时他在花厅的一张长方形紫檀木诊案前对病人“望闻问切”,学生与子侄等则恭坐案侧,代写药方。傍晚诊余,他向学生讲授医学原理、用药方法及临床经验等,其“悉心传教,医人不倦”的医者风范亦由此烙印进他们心里。

中医传承之路并不平坦,自西学东渐以来,中西医之论争就

从未停息。1929年,国民政府企图“废止旧医”,身为福州中医公会理事的郑孝铭与同仁联名通电抗议,还在处方笺印上“废止中医,无形灭种”等字。中医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,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,与人民的健康福祉息息相关,焉有废弃之理。为了挽救中医,痛心疾首如郑孝铭的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奔走呼吁,最终保住了这项“国粹”。

闽派中医源远流长,是中医流派中不可分割的一脉。东汉时期,侯官人董奉与张仲景、华佗并称“建安三神医”,留下“杏林春暖”的古语佳话;南宋时期,长乐朱端章、三山杨士瀛双璧争辉、名重东南;之后涌现出明代的萧京、郑大忠,清代的陈修园、林玉友,近代的力钧、陈登铠等一大批名医。

郑孝铭改进的“胃病神药”,其他药店都做不出来。他高超的

医术和高尚的医德,吸引了大批市民乃至达官显贵前来看病。民国初,海军总长刘冠雄倡议成立“心社”慈善救济团体,组织福州一批名医,轮流在南门兜附近设诊所,免费为贫苦患者和麻风病人义诊,郑孝铭亦在名医之列。当时,患者都是到瑞来春参行拿药,一些无力支付药费的患者,瑞来春参行都给予免费施药。

郑氏家族是福州为数不多的中医药世家,传了六代,出了许多名医。解放前,他们世代经营的“瑞来春参行”名气曾经一度与“回春”药店相媲美。抗战时期福州各药店纷纷倒闭,从东街到南门的繁华街市,只剩下“瑞来春参行”“大生春”“回春”这几家老店得以幸存。时光斗转,物换星移。昔日的“瑞来春参行”,后改名为“健康药店”。郑孝铭教育后辈要对病人、顾客仁心轻利,将济世救人的宗旨放在首位,此医德家风正是这家百年老药铺的“灵魂”所在。